

# 聯合 與 鬥爭

毛澤東 蔣介石  
與抗戰中的國共關係

金沖及 /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http://www.hkopenpage.com)

# 目錄

前 言 1

一、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歷史特點 3

二、國共合作抗日的最初階段 9

三、磨擦怎樣進入高潮 41

四、相對緩和的局面 105

五、局勢再度惡化 133

六、聯合政府主張的提出 151

七、結語 179

## 附 錄 185

(一) 華北事變和抗日救亡高潮的興起 187

1.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187

2. 一二·九運動爆發的由來 196

3. 各界救國聯合會的成立 204

4. 南京政府對日政策的變化 216

(二) 七七事變前蔣介石對日政策的演變 225

1. 「攘外必先安內」方針的提出 225

2. 日本侵略者的步步進逼和蔣介石的猶豫搖擺 230

3. 轉折的開始 236

4. 停止內戰、合作抗日 242

(三) 抗戰前夜中共中央戰略決策的形成	251
1. 中央紅軍到達陝北	252
2. 瓦窯堡會議	256
3. 東征和晉西會議	263
4. 對兩廣事變和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的反應	273
5. 中共中央關於逼蔣抗日的指示	279
6. 西安事變前後	289

## 徵引文獻 303

一、報刊徵引文獻	305
二、圖書等徵引文獻	307
三、海外徵引文獻	313

後記	317
----	-----

## 前 言

1937年至1945年的全民族抗日戰爭，構成近代中國歷史上一大變局。這八年，中華民族同仇敵愾，浴血奮戰，取得抗擊外敵入侵的完全勝利，成為民族復興的重大樞紐。這八年，走過的又是一條充滿驚濤駭浪、危機迭出、起伏不定的崎嶇道路。它給後人留下無數值得深思的話題。

在這場全民族抗戰中，國共合作是一個關鍵性的要素。如果當時沒有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很難形成全民族的抗日戰爭。由於大敵當前，儘管雙方仍存在種種矛盾，但在抗戰之初有過一段比較好的合作時期。隨著戰局的推移，磨擦不幸地發生了，上升了，有時甚至彷彿已到破裂的邊緣。但又一再峰迴路轉，出現相對緩和，把合作保持下來，直到抗戰勝利，始終沒有破裂。

這樣令人驚心動魄、曲折而複雜的局面，在歷史上並不多見，也是對雙方統帥部品格、智慧和駕馭複雜局勢能力的嚴峻考驗。

蔣介石在戰爭期間，雖然有時積極有時消極，但始終堅持抗戰，沒有屈服，和汪精衛截然不同。這是值得肯定的，也是國共兩黨能夠繼續合作的基礎。但他對共產黨的疑忌實在太深

## 2 聯合與鬥爭：毛澤東、蔣介石與抗戰中的國共關係

了，總是力圖限制以致伺機消滅共產黨，這是磨擦產生和上升的根由。但由於國內和國際諸多因素的制約，他也有所顧忌，不敢把事做絕，往往留有餘地，碰了釘子就暫時歇手。直到抗戰勝利後，才發動全面內戰。

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以沉著冷靜的態度，從容應對起伏不定的種種風浪。他們總結以往的歷史經驗和痛苦教訓，正確處理聯合與鬥爭的關係。這個異常複雜而又具有關鍵意義的問題既不像大革命時期和抗戰時期王明主張的那樣，「一切聯合，否認鬥爭」，犯右的錯誤；又不像十年內戰時期三次「左」傾錯誤那樣，「一切鬥爭，否認聯合」。而在鬥爭中，又根據實際情況，採取「有理、有利、有節」的恰當做法，鬥而不破，一次次地化險為夷，不斷取得新的成功，在處理全民族抗戰時期的國共關係上，一直處於主導地位。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已經過去七十多年的歷史和先人的智慧，至今依然可以給我們不少有益的啟示。

## 一、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歷史特點

要談全民族抗日戰爭中的國共合作，首先必須從當時國共關係全局的實際情況出發。

如果把國共這次合作同十年前的第一次國共合作相比較，這個時期的國共關係有幾個顯著的特點。

第一，它是民族矛盾處於壓倒一切地位時形成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的大革命，主要矛頭指向受帝國主義列強支持的北洋軍閥，鬥爭的主要形式是北伐戰爭。那時，北洋軍閥的統治已很脆弱；十多年的軍閥統治和混戰在國內極端不得人心，軍閥陣營內部又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所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開始，幾乎是長驅直入，居於明顯的優勢地位。佔領上海、南京後，蔣介石覺得自己羽翼已經豐滿，不再需要共產黨這個合作夥伴，便翻過臉來實行「清共」。而全民族抗戰時不同了。一個民族敵人深入中國國土這一事實，起著壓倒一切的決定作用。日本是一個擁有強大軍事和經濟實力的帝國主義國家。它的野心又那麼大，要滅亡中國，在中國實行殖民統治。現實生活使大家看到：侵略軍鐵蹄所到的地方，處處是慘絕人寰的屠殺、焚燒和劫掠。中華民族已處在生死關頭，對國共兩黨都是如此。只有合作抗日，才能維護整個民族的獨立和生存。誰主

張並實行團結抗日，誰就能得到人心；相反，便受到人民反對。這決定了合作的長期性。在整個抗戰過程中，儘管雙方的關係有過大起大落，合作卻始終保持著，沒有破裂。

第二，它是國共兩黨經歷了十年內戰的生死搏鬥後形成的。國民黨在 1927 年發動突然政變，昔日的盟友一下成為兇殘的劊子手。中國共產黨那時還是年輕的黨，成立只有五六年時間，以前的工作主要集中在學生運動和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只是初步做了一些，對待那些善用政治手腕的官僚、政客和新軍閥幾乎沒有經驗，對理論和中國國情的了解還很不夠，對國共關係突然全面破裂無論思想上和行動上都缺乏準備。據中共六大不完全的統計：從 1927 年 3 月到 1928 年底，共產黨員和進步群眾被殺害的達三十一萬多人，其中共產黨員兩萬六千多人。黨的許多優秀領導人如瞿秋白、蔡和森、惲代英、陳延年、趙世炎、羅亦農、彭湃、張太雷、方志敏、鄧中夏、陳喬年等先後犧牲在國民黨屠刀之下。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流的血太多太多了。1927 年和 1934 年，中國共產黨兩次被逼到毀滅邊緣。這種傷痕是很難淡忘的。而在抗日戰爭過程中，處於強勢地位的國民黨當局一方面堅持抗戰，在抗戰初期還想利用中共領導的軍隊一起抵抗日本軍隊的進攻，另一方面又總想限制、削弱以致伺機消滅共產黨。有過慘痛教訓的共產黨對此不能不時刻抱有戒備。這又不可避免地給合作帶來極大的複雜性，有時甚至發展為嚴重的對立和衝突。

抗日戰爭時期國共合作中的聯合與鬥爭，首先是上述這兩個基本特點決定的：前一個特點決定了兩黨合作抗日的長期

性，後一個特點又造成合作的複雜性。兩者的相互關係並非一成不變，也不是直線式地發展，而是隨著國內外局勢的變動而起伏不定：有時（特別是抗戰初期）合作得比較好；以後也有過相互關係比較和緩，甚至出現某些好轉；而有時（特別在皖南事變前後）卻出現狂風惡浪式的嚴重危機，彷彿已走到破裂的邊緣。但基本局面沒有改變：合作中一直存在著鬥爭，而鬥爭不管多麼劇烈，在整個抗日戰爭過程中也始終沒有破裂。

第三，它是在國共雙方都有自己的軍隊和政權的情況下合作的。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國民黨只有廣東一省並不鞏固的政權和不多的軍隊；共產黨在群眾運動中雖有很大影響，但沒有掌握政權，又幾乎沒有軍隊。而第二次國共合作時，國民黨已「有著全國性的政權和強大的軍事力量，並且有十年一黨專政的統治」；<sup>①</sup> 共產黨也有了自已領導的軍隊和政權，而且有很強的戰鬥力。國共合作首先從雙方軍隊的合作抗日開始，這是合作的主要內容。但國民黨很自大，合作是不平等的，而且始終把限制、削弱以致伺機消滅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和政權作為它最關切的問題。共產黨如果失去自己領導的軍隊和政權，就只能處在聽人宰割、束手待斃的地位，這是慘痛的歷史經驗證明了的，是一刻也不能遺忘的。因此，軍隊和政權問題上限制與反限制的鬥爭，成為貫穿這個時期國共兩黨矛盾的焦點。

第四，它是在世界反法西斯陣線逐步形成的新歷史條件下實現的。第一次國共合作時，資本主義世界剛從第一次世界

---

① 任弼時著：《任弼時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80頁。

大戰後的嚴重社會危機中擺脫出來，進入相對穩定時期，以很大力量對付世界各地的革命運動。在遠東佔有最大權益的英、日、美三國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態度大體上是一致的：最初抱著敵視的態度，以後又盡力擴大國共矛盾，把蔣介石拉過去，支持他的反共活動。而第二次國共合作時的情況起了很大變化。從國際範圍來說：囂張不可一世的以德、日、意為軸心的法西斯勢力迅速崛起，以挑起大規模戰爭（特別是「閃電戰」）的手段，企圖稱霸世界，對人類社會構成最嚴重的威脅。這樣，便形成反法西斯陣線與法西斯陣線的對立。在遠東，不僅蘇聯，就是美、英也希望中國能團結抗日，以牽制更多的日本兵力，不贊成國共分裂。這對中國共產黨提倡的團結抗日是有利的。但這兩大對立陣線的形成有一個過程，中間風雲變幻，變化很多也很快，有時甚至使人覺得似乎難以捉摸。這又增加了國內政治局勢演變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應對這樣關係到國家民族命運而又異常複雜的局面，恰當地處理好國共合作中聯合與鬥爭的關係，確實極為不易。到抗戰的中後期，尤其如此。對作為國共雙方領導人的毛澤東、蔣介石來說，既有戰略視野和政治智慧的較量，又有意志和勇氣的考驗。而雙方領導人的決斷，對局勢的發展演變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本書準備著重考察毛澤東、蔣介石怎樣應對抗戰中的國共關係。當然，也不能不涉及當時國共關係中的某些一般情況和雙方其他領導人的活動。

談這個問題，本來應該先講九一八事變對中國的巨大震撼，特別是華北事變後國共關係出現變化和西安事變後兩黨

如何停止內戰、實現第二次合作，才能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講清楚，但我寫過《抗戰前夜中共中央戰略決策的形成》（《歷史研究》2014年第1期）、《七七事變前蔣介石對日政策的演變》（《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1期）、《華北事變和抗日救亡高潮的興起》（《歷史研究》1995年第4期）幾篇論文。本書就從1937年全民族抗日戰爭開始時說起，而把那三篇文章作為附錄。

## 二、國共合作抗日的最初階段

1937年7月7日的盧溝橋事變，標誌著全民族抗日戰爭的開始。在這場戰爭中，國共兩黨共同抗日。尤其是抗戰初期，雙方的合作比較好。

中國共產黨對實行全民族抗戰的態度，一開始就十分鮮明和堅決。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發表宣言：「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sup>①</sup> 7月11日，毛澤東、朱德致電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中日戰爭有擴大之勢，已由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向蔣交涉紅軍調赴河北應戰。」<sup>②</sup> 14日，中共中央致電葉劍英，要他通過西安行營轉告蔣介石：「願在蔣指揮下努力抗戰，紅軍主力準備隨時出動抗日，電令各軍十天內準備完畢，待令出動，同意擔任平綏線國防。」<sup>③</sup> 同一天，朱德為紅軍將士題詞：「日本強盜奪我東三省，復圖佔外蒙，又侵我華北，非滅亡我全

---

①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11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頁。

② 毛澤東、朱德致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電，1937年7月11日。

③ 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致葉劍英電，1937年7月14日。

國不止。我輩皆黃帝子孫，華族胄裔，生當其時，身負干戈，不能驅逐日本出中國，何以為人！」<sup>①</sup> 16日，毛澤東、朱德又致電彭德懷、任弼時等：在南京政府「許可主力紅軍參戰條件下，擬以原一、二、四方面軍出動，即以方面軍編為師，軍編為旅，旅編為團」。<sup>②</sup>

8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對盧溝橋事變是否已肯定地成為全民族抗日戰爭的開始，而不是局部性的事件，作出明確的判斷：「應估計大戰已經到來，新的階段在7月7日晚上即已開始。抗戰已經開始，準備抗戰的階段已經結束。」「盧溝橋事件是非偶然的，過此界限，非抗戰不可。」<sup>③</sup> 這個判斷極其重要，是接著所採取一系列行動部署的依據。

8月22日，中共中央在陝北洛川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是中國共產黨在全民族抗戰剛剛爆發的歷史轉折關頭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一共開了四天。會議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指出這場戰爭必將是持久而艱苦的，必須做到全國人民總動員，實行全面抗戰。這就要求給人民以抗日所必需的民主自由權利，改善勞動大眾的生活。如果不進行有利於抗日的根本改革，不把民眾充分發動起來，而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的片面抗戰，將無法取得勝利。動員全民奮起的「全面抗戰」還是單純依靠政府和軍隊作戰的「片面抗戰」那場爭論，就是由此開始的。洛川會議本著這種精神，通過《抗日救國十大綱領》。

---

① 朱德著：《朱德軍事文選》，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97年版，第256頁。

② 毛澤東、朱德致彭德懷、任弼時並告葉劍英、劉伯承、張浩電，1937年7月16日。

③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8月9日。

由於紅軍即將開赴前線對日作戰，一個新的問題提到面前：紅軍對日軍應該怎樣作戰？這時，紅軍將要遇到和交手的對象和以往不同，是由精良的現代武器裝備起來並受過嚴格軍事訓練的日本侵略軍，但他們的兵力終究有限，又受到中國民眾的強烈反抗。毛澤東在會上所做的軍事報告中，及時地根據日軍的特點，指出紅軍作戰方針應該確定為是「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爭（包括有利條件下消滅敵人兵團與在平原發展游擊戰爭，但著重於山地）」。並說明：這種獨立自主是在統一戰略下的「相對的獨立自主」。<sup>①</sup> 這是紅軍作戰方針的重大改變，是適應抗日戰爭這種新的歷史條件下克敵制勝的唯一正確方法。對這個問題，毛澤東比誰都認識得更早更清楚。

洛川會議上，決定改組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主席。它在 8 月 25 日正式發佈命令：「南京已經開始對日抗戰，國共兩黨合作初步成功。為著實現共產黨中央給國民黨三中全會紅軍改名之保證，使紅軍成為抗日民族戰爭的模範，推動這一抗戰成為全民族的抗日革命戰爭，以爭取最後的徹底勝利。特依據與國民黨及南京政治談判結果，宣佈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sup>②</sup> 八路軍主力在 8 月、9 月間由朱德、彭德懷率領，從陝西三原地區和富平縣出發，東渡黃河，挺進華北抗日前線。

八路軍在國難深重的關頭，毅然開赴山西前線同日本侵略

---

① 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軍事報告，1937 年 8 月 22 日。

②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331 頁。

軍作戰，是何等可敬。可笑的是，在六年以後，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 1943 年 9 月 13 日通過一份秘書處《關於中共破壞抗戰危害國家案件總報告》之決議，其中說：「此種陰謀，具見十八集團軍由延安出發晉北時，毛澤東對幹部之訓話所謂『中日戰爭為中國共產黨發展之絕好機會，我們的決策，七分發展、二分對國民黨應付，其餘一分為抗日』。」<sup>①</sup> 這段話據他們說出自一個叛逃的八路軍連級幹部的口供。像這樣無中生有，毫無事實根據的所謂下級軍官的「口供」，竟赫然見諸國民黨中央全會正式通過的文件，以後又多次被一些文章和書籍反覆引用，豈不荒唐！

再來看蔣介石對抗日戰爭的態度怎麼樣。

以往，日本侵略者曾多次發動過局部地區的軍事行動。盧溝橋事變後時局發展會怎麼樣？蔣介石一時還看不準。他在 7 月 8 日的日記中寫道：「倭寇在盧溝橋挑釁矣。彼將乘我準備未完之時，使我屈服乎？或故與宋哲元為難，使華北獨立乎？」<sup>②</sup> 他覺得還存在著兩種可能性。第二天，他致電閻錫山說：「此間於昨日得到盧溝橋衝突消息後，即電軍事委員會通令全國戒嚴，並準備全部動員，以防事態之擴大，另令孫仿魯（連仲）部兩師及龐更陳（炳勳）、高培五（桂滋）等部，即向保定石家莊集中，務祈即行準備，嚴密防範，至對於此事應如何應

---

① 秦孝儀總編纂：《蔣介石大事長編初稿》卷 5（上冊），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8 年 10 月版，第 379 頁。

②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 年 7 月 8 日。

付，尚祈見示。」<sup>①</sup> 孫連仲、龐炳勳都是原馮玉祥部的西北軍，高桂滋是陝北的地方勢力，都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他仍小心翼翼地按照 1935 年的「何梅協定」的約束，不敢派嫡系部隊北上，還想再看一看。在 7 月 10 日的日記中寫道：「我軍已開始北進，彼或可於明日停戰乎？」到 12 日仍寫道：「非至萬不得已，不宜宣戰。」<sup>②</sup>

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徐永昌同天日記中寫道：「何敬之（引者注：即何應欽）電話：盧溝橋和平解決方案又較有具體開展。」<sup>③</sup>「此間亦似盼望和平。」<sup>④</sup> 蔣介石的兒子蔣緯國在《抗日戰爭指導》一書中寫道：「蔣委員長在當時並不想和日本開戰，這是可以體認的。」<sup>⑤</sup>「因為在七七事變發生後，蔣委員長仍然希望日本政府約束軍人，不使事態擴大。」<sup>⑥</sup> 至於國共關係，內戰雖在西安事變後已經停止下來，但如何合作抗日，一時還沒有提到具體議事日程上來。

但局勢迅速惡化，平津已危在旦夕，日本決心全面侵華的野心日益明顯。蔣介石知道再也無法退讓了。他下了決心，在 7 月 16 日致電宋哲元：「盧案必不能和平解決。無論我方允其任何條件，而其目的則在以冀察為駐兵區域與區內用人組織皆

① 秦孝儀總編纂：《蔣介石大事長編初稿》卷 4（上冊），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8 年 10 月版，第 70、71 頁。

②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 年 7 月 10 日、12 日。

③ 徐永昌著：《徐永昌日記》第 4 冊（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年影印，第 75 頁。

④ 蔣緯國著：《抗日戰爭指導》，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 年版，第 426 頁。

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東。若不做到此步，則彼必得寸進尺無已事。決心運用全力抗戰，寧為玉碎，毋為瓦全。」<sup>①</sup> 這是他第一次如此明白地表示他下決心進行這場戰爭了。第二天，他在廬山談話會上坦率地說：「如果盧溝橋可以受人壓迫強佔，那末我們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和軍事重鎮的北平就要變成瀋陽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果變成昔日的瀋陽，南京又何嘗不可變成北平。」他在講話中說了一句傳頌一時的話：「如果戰端一開，那就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sup>②</sup> 這句話得到國內的普遍讚揚。蔣介石在 19 日的日記中寫道：「立意既定，無論安危成敗，在所不計。」「談話稿既發表，只有一意應戰，不再作迴旋之想矣。」

國難當頭，蔣介石自知兵力不足，國共共同抗日便成為更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 19 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對共黨之收編應即解決。」<sup>③</sup>

蔣介石下定抗戰的決心是值得讚揚的。國民黨是當時中國最大的控制著統治權的政黨，南京政府有著兩百萬軍隊和得到國際承認的外交地位。沒有它的參加，全民族抗戰是難以形成的。但他對國共合作談不到有平等的態度，不過是想對共產黨

---

① 錢世澤編：《千鈞重負：錢大鈞將軍民國日記摘要》（一），台北：中華出版公司，2015 年版，第 482、484 頁。

② 秦孝儀主編：《蔣介石思想言論總集》卷 14，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年版，第 583—585 頁。

③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 年 7 月 19 日。

實行「收編」，完全受他的控制。這樣的談判自然不會被共產黨接受，也不會有甚麼結果。

這以後十幾天內，北平、天津相繼淪陷。7月29日，蔣介石對記者發表談話：「日本既蓄意侵略中國，不惜用盡種種手段，則可知今日平津之役，不過其侵略戰爭之開始，而絕非其戰事之結局。」<sup>①</sup> 8月13日，淞滬戰役爆發，戰火燃燒到南京政府統治的心臟地區。這對蔣介石的刺激自然更大了。他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至此，雖欲不戰而不可得，否則國內必起分崩之禍。與其國內分崩，不如對倭抗戰。」<sup>②</sup> 蔣介石侍從室負責軍事工作的一處主任錢大鈞，也在當天日記中寫道：「今夜，余與俞樵峰（飛鵬）等宴共黨之周恩來、朱德、葉劍英。席間，談笑甚樂。」<sup>③</sup>

蔣介石對待共產黨的態度，是隨日本侵略者對他威脅和壓力的大小而變化的。

共產黨在十年內戰中已經有了自己的軍隊和政權，尤其是軍隊，這是蔣介石最不放心的。在這以前，他在這年3月6日的日記中曾寫道：「對『共匪』只可編其部隊，而決不許其成立軍部或總指揮部。」6月8日至15日，周恩來在廬山同蔣介石、宋美齡、宋子文進行多次會談。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

---

① 秦孝儀總編纂：《蔣介石大事長編初稿》卷4（上冊），台北：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8年10月版，第93頁。

②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年8月31日，「本月反省錄」。

③ 錢世澤編：《千鈞重負：錢大鈞將軍民國日記摘要》（一），台北：中華出版公司，2015年版，第502頁。

道：「共黨尚欲設軍事總機關，余嚴拒之。」<sup>①</sup> 但口頭上又向周恩來等表示：三個師以上的政治機關可以代行指揮權。這樣說只是敷衍搪塞罷了。盧溝橋事變發生後，7月14日，他又要負責國共談判的國民黨代表張沖轉告周恩來：「部隊在改編後，各師須直隸行營，政治機關只管聯絡。」連「可以代行指揮權」也不再提了。很顯然，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先拆散，分別置於他控制的軍隊指揮下，逐步分化瓦解，最後加以吞併，這是他收拾許多地方實力派部隊時慣用的手法。共產黨自然不會上這種當。周恩來第二天憤然致信蔣介石：「此與來（注：周恩來自稱）上次在廬所面聆及歸陝向黨中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僅事難做通，且使來一再失信於黨中同志，恐礙此後各事之進行。」<sup>②</sup> 這其實是痛斥蔣介石「一再失信」，將「礙此後各事之進行」。談判在一段時間內陷入僵局。

到八一三戰役爆發後，戰局十分不利。在上海指揮作戰的陳誠在日記中一再寫道：「淞滬在戰略上對我極為不利。」「政府平時毫無準備，戰時手忙腳亂，此次臨時令我與顧（祝同）來負此重責，事前毫無所聞，一切均無從著手，自難有妥當辦法。」<sup>③</sup> 中國軍隊先後有七十多萬人在日軍掌握制空權和制海權的濱海城市，浴血奮戰，拚陣地消耗，犧牲極大，無力支援

---

①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年3月6日、6月9日。

② 《周恩來書信選集》編委會編：《周恩來書信選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36頁。

③ 陳誠著：《陳誠先生日記》（一），台北：「國史館」，2015年版，第155、156頁。

其他地區的作戰。在這種情況下，蔣介石迫切需要有強戰鬥力的工農紅軍迅速開赴華北前線投入戰鬥。於是，原來談判中一直僵持不下的軍隊番號、編制和指揮問題頓時急轉直下地得到解決。

蔣介石一改原來的態度，於8月18日同意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任命朱德、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他在8月28日的日記中寫道：「近日戰局漸轉劣勢，人心動搖。」「惟共黨態度漸劣，惟有順受之。」<sup>①</sup>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國共談判中長時間僵持的焦點終於得到消解。這樣，八路軍才能開赴山西前線，同友軍合作，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軍。以後，蔣介石又同意將中共領導的南方各省游擊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以從海外歸來的葉挺任軍長。

接著，另一個問題也得到解決。正在廬山同蔣介石談判的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在7月中旬已將《中共中央為公佈國共合作宣言》面交蔣介石。但他的態度卻十分冷淡，不願發表。隨著淞滬戰役吃緊，蔣介石的態度也軟化了。9月17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滬戰最為危急。」19日寫道：「共黨宣言准予發表。」<sup>②</sup>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佈了這個《宣言》。第二天，蔣介石發表談話稱：「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之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徹底更始，力圖團結，以共保國家

---

①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年8月28日。

②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年9月19日。

之生命與生存。」<sup>①</sup> 儘管共同的政治綱領談了幾次，始終沒有形成，但由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公佈中共的《宣言》並發表蔣介石的談話，終究在一定程度上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這還是前進了重要的一步。陝甘寧邊區政權問題雖沒有完全達成協議，但國民黨方面也無法改變這早已形成的事實。

9月25日，毛澤東和張聞天致電正在同蔣介石談判的周恩來等，肯定國民黨這個舉動：「你們談話請根據下列諸點：一、我們宣言及蔣氏談話宣佈了統一戰線的成功。建立了兩黨團結救國的必要基礎。二、這個宣言不但將成為兩黨團結的方針，而且將成為全國國民大團結的根本方針。中華民族之復興，日本帝國主義之打倒，將於今後的兩黨團結與全國團結得到基礎。三、蔣談話指出了團結救國的深切意義，確定了共產黨在全國合法地位，發出了『與全國國民徹底更始』的諾言。但還表現著自大主義精神，缺乏自我批評，未免遺憾。今後問題是徹底實現三民主義及與三民主義相符合的中共提出的十大綱領。」<sup>②</sup> 這個發給周恩來等的內部電報，表明共產黨對國共合作的正式實現是充分肯定的，是充滿誠意的。電報中批評國民黨的「自大主義精神」是指它仍抱著不平等的姿態，「缺乏自我批評」是指它依然存在壓制民眾運動等「片面抗戰」的缺陷，因此，在合作中仍需要保持批評的權利。這些都是為了掃除障

---

① 秦孝儀主編：《蔣介石思想言論總集》卷38，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95頁。

②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43、44頁。

礙，更好地實現和維護國共的合作抗日。

淞滬戰役失敗後，日軍迅速西進，南京危在旦夕。12月11日，蔣介石在「本週反省錄」中寫道：「南京萬一被陷，則對內部、對共黨、對國民應有鮮明態度之表示：決定抗戰到底，義無反顧。」南京失陷後，他又在12月21日的日記中寫道：「與共黨代表談組織事。此時對共黨應放寬，使之盡其所能也。」<sup>①</sup> 經過淞滬會戰失利和南京失陷，蔣介石嫡系部隊的主力受到相當大的損失。在華北的主要戰場上，閻錫山的晉軍又一敗再敗。因此，蔣介石對共產黨的態度確實「放寬」了不少，以便「盡其所能」，這是形勢所迫的結果。

這以後直到武漢和廣州失守，國共合作的狀況，總體上比較好。毛澤東在《論聯合政府》中寫道：「從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盧溝橋事變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這一個時期內，國民黨政府的對日作戰是比較努力的。在這個時期內，日本侵略者的大舉進攻和全國人民民族義憤的高漲，使得國民黨政府政策的重點還放在反對日本侵略者身上，這樣就比較順利地形成了全國軍民抗日戰爭的高潮，一時出現了生氣蓬勃的新氣象。」<sup>②</sup>

國共合作抗日，首先表現在抗日作戰的戰場上。

國民黨在這個時期內的對日抗戰確實是比較努力的。拿淞滬會戰來說，蔣介石投入的七十多萬兵力中，他的嫡系部隊除衛立煌、湯恩伯等部在華北外幾乎都參加了，桂軍、粵軍、川

---

①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年12月21日，「本週反省錄」。

② 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7頁。

軍、滇軍、湘軍、東北軍等也先後投入戰鬥，浴血苦戰達四個月。接著，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的台兒莊戰役，是中國軍隊取得的巨大勝利，殲滅日軍近一萬兩千人。捷報傳來，舉國歡騰。周恩來說：「台兒莊、魯南戰爭的勝利，促進各軍抗戰的決心。」<sup>①</sup>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這時東進山西前線。周恩來和彭德懷、徐向前（山西五台人）在9月7日先趕到山西太和嶺口閻錫山的前線指揮部，同閻會商兩軍合作抗日的問題。薄一波回憶道：「談判後，閻錫山對我說：『周先生對抗戰前途看得非常清楚。』閻錫山還要周恩來同志給他寫個第二戰區的作戰計劃。周恩來同志僅用一天的時間，就把作戰計劃寫好了。閻錫山看了很吃驚，連說：『寫得這樣好，這樣快！如能這樣打，中國必勝！』他慨歎：『周先生的確是個大人才。國民黨是沒有這樣的人才的！』」<sup>②</sup>

八路軍開到山西前線後，在太原失守前主要是直接配合國民黨中央軍和晉軍共同作戰。平型關伏擊戰是八路軍出師後第一次集中較大兵力對日軍進行的成功戰役，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這次戰役，擔任正面防禦的是晉綏軍四個師和幾個旅，左翼是高桂滋部陝軍，右翼是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當日軍進入右側山路時，受到早就埋伏在這裡的八路軍突然襲擊，共殲敵近千人，繳獲不少武器輜重。時任閻錫山高級參謀的老同盟會會員續範亭寫道：「謹按平型關戰役，八路軍的大捷，其估

---

①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1938年9月15日。

② 薄一波著：《領袖元帥與戰友》，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91頁。

價不僅在於雙方死亡的慘重，而在於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了我們的士氣。在敵人方面，從南口戰役以來，日寇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在平型關忽然受到慘重的打擊和包圍被殲，使日寇知道中國大有人在，銳氣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樣的長驅直入。」<sup>①</sup> 毛澤東發電稱：「是役已將敵攻平型關計劃破壞」，「我們捷報發至全國，連日各省祝捷電甚多」，並且說到發電祝捷的個人和單位中包括有蔣介石。<sup>②</sup>

忻口戰役是守衛太原最後門戶的重要戰役。蔣介石嫡系將領衛立煌任第二戰區前敵總指揮，率領中國軍隊八萬人堅守陣地，頑強抗擊。八路軍三個師配合正面作戰，先後收復雁門關、平型關，還奇襲陽明堡機場，焚毀那裡的全部日軍飛機二十四架。朱德對來到山西前線的英國記者貝特蘭說：「敵人已直接從北方沿其他的路線前進。他們已經頑強地推進到忻口。中央軍和晉軍扼守忻口。這裡就起了惡戰。南京的軍隊打得很好——他們堅守了三個星期。我們很欽佩衛立煌將軍在忻口的抵抗。同時，我們的軍隊迅速向北移動。正如你所知道的一樣，我們克復了雁門關。不久，我們的軍隊獨立行動，就切斷了日軍的三條路線——自大同到雁門關的路線、自蔚縣到平型關的路線，以及西方的自朔縣到寧武的路線。在這時候，已向南方前進的日軍遭了嚴重的困難。他們不能取得給養，因為道路被我們佔領著。運輸軍火的車子不得不中途折回。他們沒有汽油的供給，因此

---

① 續磊、穆青編著：《續範亭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頁。

② 毛澤東著：《毛澤東軍事文集》第2卷，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頁。

不能運用機械化部隊。曾有一時，日軍真的到了絕望的境地。」<sup>①</sup> 貝特蘭對外作了報道。衛立煌對周恩來說：「八路軍把敵人幾條後路都截斷了，給我們忻口正面作戰的軍隊幫了大忙。」<sup>②</sup> 這是國共雙方在正面戰場上配合得最好的一場作戰。

太原失守後，戰場上的形勢發生很大變化。國民黨正規軍基本上向南或向西渡過黃河撤走，閻錫山也率部西渡黃河遷到陝西宜川縣的秋林鎮（以後又移到緊靠黃河東岸的克難坡），有較強戰鬥力的主力只有衛立煌部仍留在豫北的中條山區。八路軍並沒有隨著渡黃河西撤，繼續堅持以山西為主要陣地支撐華北抗戰。它的主力向敵後挺進，建立抗日根據地，開展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第一個就是依託五台山的晉察冀根據地。毛澤東在延安的一次報告中說：「在華北，以國民黨為主體的正規戰爭已經結束，以共產黨為主體的游擊戰爭進入主要地位。」<sup>③</sup> 1938年3月9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聽美國武官報告第八路軍作戰經過。」第二天，蔣介石的日記中又寫道：「對晉南部隊之處置無人總其成，決派朱德指揮。」<sup>④</sup> 11日他就直接電令第三軍軍長曾萬鍾、第十四軍軍長李默庵、第十七軍軍長

---

① [英] 詹姆斯·貝特蘭著，林淡秋等譯：《華北前線》，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頁。

② 趙榮聲著：《回憶衛立煌先生》，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頁。

③ 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7—388頁。

④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8年3月9日、3月10日。

高桂滋、第四十七軍軍長李家鈺：「於衛俊如（注：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衛立煌）未到以前，望兄等皆受朱德總司令之指揮，務希和衷共濟，使各部門行動配合整個計劃，發揮效能，克奏膚功。」<sup>①</sup>不久，朱德又升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這仍是國共兩黨在軍事上密切配合作戰最好的時期。

為甚麼八路軍到了敵後不僅能站住腳跟，並且很快地發展起來？

朱德在回答英國記者貝特蘭時說：「第一，這是山地戰，因此敵人不能用坦克和飛機；還有，因為這是奇襲。第二，我們有其他的正規華軍的合作和幫助。」「我們已經看出，日本的步兵在獨立動作的時候並不十分靈動。他們的交通和給養全賴機械的工具。如果這些被人截斷，他們就陷於真實的不利，他們不能利用山地，而必須走最容易的最平坦的路線。」朱德著重地指出八路軍作戰和其他許多部隊不同的根本特點：「我們有民眾的幫助，我們已把民眾組織並訓練成游擊隊，以騷擾敵人的交通線。」「在他們進軍的主線以外，日軍一點不曾佔領甚麼。我們的軍隊深入在他們的後方，而且——因為河北的義勇軍和游擊隊的合作——實際上已佔據了他們所通過的整個的區域。我們無須顧慮後方，因為我們是在自己的國土中作戰，無論到了哪裡，民眾都支持我們，給予我們以實物和幫助。」朱德還告訴貝特蘭：「你知道的，第八路軍並不為了中國共產主義作戰，而且聯合所有其他的軍隊為了中國民族的獨立作戰。」

---

①《民國二十七年之蔣介石先生》，台北：政治大學人文中心，2016年版，第125頁。

我們連同國民黨的軍隊，正在為了自由民主的中華民國作戰。」貝特蘭寫道：「我覺得朱德說這話的時候，是誠摯的。我所見過的中國共產黨員，無論在他們自己的區域中或在軍隊中，都充分擁護這個主張。」<sup>①</sup>

當八路軍主力向敵後挺進時，毛澤東致電前方各將領叮囑：「必須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八路對華北各友軍尤其對閭及各縣地方政權，地方紳士，必須保持好的友好關係，一切須求合法與統一，減少磨擦。」<sup>②</sup>

八路軍在華北敵後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並得到發展，是從日本佔領區收復國土，得到民眾的支持，完全不應該受到以後發生的無端指責，更談不上甚麼「割據」行為了。

國共合作抗日，還表現在其他方面。

在大後方，經中共中央同意，周恩來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部長是陳誠），郭沫若擔任負責宣傳工作的政治部第三廳廳長。第三廳人才濟濟，擁有大批全國知名的進步文化人士，包括陽翰笙、胡愈之、田漢、張志讓、洪深、杜守素、馮乃超、史東山、應雲衛、冼星海、張曙等。他們在武漢地區開展了轟轟烈烈的抗日宣傳週，每天有一個主題，如歌詠日、戲劇日、電影日、漫畫日等，包括組織四五十萬人參加的慶祝台兒莊大捷的火炬大遊行，後來又舉行了熱烈的獻金活

---

① [英] 詹姆斯·貝特蘭著，林淡秋等譯：《華北前線》，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167、169—171頁。

②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頁。

動。第三廳所轄十個演劇隊和孩子劇團到各地演出，也產生不小的影響。

這時，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在大後方得到公開出版發行，批判了喧囂一時的「亡國論」和「速勝論」，指出抗日戰爭將經過戰略防禦、戰略相持、戰略反攻三個階段，兵民是勝利之本，最後勝利屬於中國。在人們面前清晰地描繪出戰爭將如何發展的全過程，產生極大反響，增進了大後方民眾對共產黨的了解。

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許多重要城市設立公開的辦事處或通信處。《新華日報》和《群眾》週刊在大後方得以公開發行，儘管在事實上仍受到許多限制和迫害。

國民黨在 1938 年 3 月 29 日至 4 月 1 日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中共中央書記處向各中央局、各省委特委發出指示，表明黨應採取積極的立場：「立在主動地位，取積極贊助與擁護的態度，指出其基本精神同我黨的主張是一致的。」「關於其中反對階級鬥爭與反對國際主義的理論以及其他缺點，應給以側面的適宜的解釋。」<sup>①</sup>

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後，接著召開的五屆四中全會通過《國民參政會組織條例》。國民參政會的成員主要是國民黨方面的人，也有一部分黨派、社會團體和各界的代表，中共領導人也有七人為國民參政員；這個參政會雖然只能發點議論，並無任何實權，但終究有了這樣一個常設機構。一些參政員利用這個場合慷慨陳詞，產生不小的社會影響。當時，國民黨副總裁、國防

---

<sup>①</sup>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91 頁。

最高會議副主席汪精衛在戰事緊要關頭公然鼓吹反對繼續抗戰的「和平」主張。1938年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第二次會議在重慶舉行。救國會領袖鄒韜奮寫道：「開幕之後，霹靂一聲，陳嘉庚先生在新嘉（加）坡來了一個電報提案（陳先生也是國民參政員，當時因事未到），內容極簡，而意義極大。這個提案的內容只是這寥寥十一個大字：『官吏談和平者以漢奸論罪！』這寥寥十一個字，卻是幾萬字的提案所不及其分毫。」<sup>①</sup> 這種狀況在過去不曾有過。國民黨表現得比過去還是有了不少進步。

為甚麼國共合作在這個時期能夠處在良好的狀況？毛澤東說：「國共兩黨，合則兩利，分則兩傷，這是過去歷史已經證明了的。」「合作是在一定條件之下的。甚麼條件呢？就是反帝反封建。誰能遵守這一條就與之合作到底。」<sup>②</sup> 這就把問題說得很清楚了。以後雖然蔣介石發動三次反共高潮，國共關係發展到破裂的邊緣，共產黨依然堅持國共合作，避免破裂，原因同樣在這裡。而蔣介石儘管一心想伺機消滅共產黨，但在採取行動時仍不敢把事情一下子做絕，原因也與此有關。

從國際範圍來看，那時英、法兩國正恐懼地感受到德國納粹勢力的迅猛發展，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戰場是在法國境內，造成當地人民生命財產的極大損失，使他們心有餘悸，竭力以退讓來避戰，因此，便盡力推行綏靖政策，無力顧及東亞；美國剛經歷那場空前的經濟大危機，國內的孤立主義思潮佔著優勢地位；而蘇聯正在給予中國軍事援助。陳誠在1937年9月30日的家書中

---

① 鄒韜奮著：《韜奮全集》第10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頁。

② 毛澤東對抗大一大隊成立的演講詞，1938年5月4日。

寫道：「俄國幫助中國兵器不少。」<sup>①</sup> 這些武器，都是交給國民黨控制的國民政府的，而不是交給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貝特蘭在《華北前線》中寫道：「我同第八路軍相處已近五個月，曾與它的好幾個部隊，有過極密切的接觸，但是我從未看見過一支蘇聯式的步槍或是機槍，更不要說甚麼大炮、坦克、飛機和蘇聯人員的蹤跡了。」<sup>②</sup> 蘇聯的空軍戰士也到武漢同來襲的日本飛機作戰。1938年七八月間，蘇聯軍隊在邊境地區張鼓峰同日軍發生武裝衝突，給予日軍重大打擊。蔣介石為了爭取蘇聯的繼續援助，也需要同中共改善關係。他以後在《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三十年經歷紀要》中回憶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經過時寫道：「中日戰爭既已無法避免，國民政府乃一面著手對蘇交涉，一面亦著手中共問題的解決。」<sup>③</sup> 可見他一直把這兩個問題聯繫在一起考慮。這種國際環境，對國共關係的改善也是有利的。

對抗日作戰中為民族生存而英勇犧牲的將士，不管他屬於哪一個黨派，中國人民都以崇敬的心情沉痛地悼念他們。1938年3月12日，延安隆重舉行紀念孫中山先生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敵陣亡將士大會。毛澤東在會上發表演講。他說：「八個月中，陸空兩面都做了英勇的奮戰；全國實現了偉大的團結；幾百萬軍隊與無數人民都加入了火線，其中幾十萬人就在

---

① 陳誠著：《陳誠先生書信集·家書》（下），台北：「國史館」，2006年版，第445頁。

② [英]詹姆斯·貝特蘭著，林淡秋等譯：《華北前線》，北京：新華出版社，1986年版，第280頁。

③ 秦孝儀主編：《蔣介石思想言論總集》卷9，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年版，第68頁。

執行他們的神聖任務當中光榮地、壯烈地犧牲了。這些人中間，許多是國民黨人，許多是共產黨人，許多是其他黨派及無黨派的人。我們真誠地追悼這些死者，表示永遠紀念他們。」<sup>①</sup>

這是全民族抗戰初期國共關係的主要方面。

但是，歷史是複雜的。蔣介石對共產黨的疑懼實在太深。他在 1937 年 11 月 4 日說：「軍事失利，反動派逐漸猖狂，共黨尤為跋扈。嗚呼，外患未消，內憂日增矣。」<sup>②</sup> 但當時「軍事失利」，需要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共同抗日，蔣介石又很自大，認為共產黨只是在向他窮促求和，所以最初在處理中共問題上傾向採用「溶共」的方式。他在 1938 年 1 月 29 日的日記中寫道：「對共黨之方針，使之融化。」<sup>③</sup> 「融化」也是消滅的另一種辦法。這已埋下此後兩黨關係逐步惡化的根苗，但由於當時局勢的限制，還沒有表面化。

國共既要合作，原應建立起比較穩定的合作關係：一是要有明確的共同綱領，二是要有比較固定的組織形式。1937 年 12 月 21 日，中共代表團去見蔣介石。這時，國民政府已遷都重慶，但黨政軍主要機構仍駐武漢。周恩來向蔣介石提出成立兩黨委員會、確定共同綱領、出版日報、補充和改造部隊等具體建議。周恩來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說：「蔣當答覆：所談極好，照此做去，前途是見好轉，彼想的也不過如此，對我們所談完全同意。彼也

---

①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 年版，第 96 頁。

② 《蔣介石五記·困勉記》（上），台北：「國史館」，2011 年版，第 583 頁。

③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8 年 1 月 29 日。

認為外敵不足慮，他欲前進困難愈多，軍事雖失利，並不足慮，只要內部團結，勝利定有把握。」<sup>①</sup> 這些話顯然口是心非，沒有誠意可言。對改善兩黨關係的這些根本問題，蔣介石的辦法是一再拖延不決，或答應了又改口變卦。他答應設立的兩黨關係委員會開過幾次會，國民黨方面沒有提出任何具體意見，形同虛設，最後不了了之。共同綱領問題事實上被擱置起來。兩黨合作的組織形式也無法解決，最後只剩下一個：隨時約見，隨時協商。事實上，由於兩黨處在不平等地位，這種「約談」和「協商」云云，只要蔣介石不允許，就甚麼都辦不成。

周恩來和中共代表團在這種處境下，仍力求通過談判先決一些具體問題，維持國共兩黨的合作。1939年8月4日至15日，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多次做了長篇發言，生動地描述這種情況：國民黨從來不承認共產黨同它有對等的地位，並且盡力限制共產黨的發展。然而它是怯懦的，只要事實的發展不危害到它的根本利益，同時事實的存在成為不可改變的，它也只好承認事實；它又是自大的，即使事情已經存在，只要它有權力否認，有可能拖延，仍然是不肯公開承認的。因此，這種合作不僅是不平等的，而且是不穩定的，只是在不得已的狀況中存在，在習慣中發展。此前此後的國共談判，大體上就是如周恩來所說的那樣進行的。

對民眾運動，國民黨當局在武漢等地仍常採取壓制措施，解散了許多群眾組織起來的很有影響的抗日團體，如蟻社。蔣

---

<sup>①</sup> 中央統戰部、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文件選編》（下），北京：檔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61頁。

介石在 1938 年 5 月 4 日的日記中寫道：「學生不准參加任何政治團體。頒行禁律：無論任何團體，如有此學生運動，應作內亂罪處置。」<sup>①</sup> 抗戰爆發後才獲得釋放的救國會重要領導人李公樸再次被捕，罪名是「煽動工潮」。連政治部三廳的活動，不久也遭遇阻礙橫生。郭沫若寫道：「陳誠要三廳搞擴大宣傳週，本心是想為新成立的政治部，為他這個政治工作的入伍生，增加一點光彩。但沒有想到武漢的民氣竟那麼一點就燃了。於是乎他，和他的一竿子人，就又害怕起來。」很快，突然用政治部名義給第三廳發出訓令稱：「查三廳近所印行各種宣傳文件中，每有『人民』『祖國』『崗位』等字樣，此等文字殊不妥帖。『人民』應一律改用『國民』，『祖國』改用『國家』，『崗位』改用『職分』。」郭沫若立刻用孫中山文章中多次使用這些「字樣」加以駁斥。「這項駁斥，以後沒有下文，但在事實上『人民』和『祖國』等字樣成為了一般的禁忌。」<sup>②</sup>

不久，一場新的更大的風潮又很快起來。1938 年初，國民黨 CC 系和復興社控制的《掃蕩報》《武漢時報》《血路》《抗戰與文化》等報刊，連篇累牘地發文鼓吹「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鼓吹「今天國民黨以外的一切黨派，都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不止今天，就是將來也沒有獨立存在的理由」。<sup>③</sup> 2 月 10 日的《掃蕩報》發表社論，公然聲言中國有三種妨礙並破壞統一的因素，把陝甘寧邊區說成西北的新的封建割據區

---

①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8 年 5 月 4 日。

② 郭沫若著：《洪波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 年版，第 59、60 頁。

③ 葉青：《關於政治黨派》，轉引自《血路》第 2 期，1938 年 1 月 22 日。

域，指責紅軍雖改易旗幟卻不服從中央，並說國民黨外存在其他黨派影響了中國的政治統一，要求取消這三種勢力。「一個領袖、一個主義、一個黨」的問題，在武漢鬧得滿城風雨。

這其實正反映了蔣介石的思想。他在二三月間日記中一再提到：「一黨制宜積極剛強」，「各黨最高領袖之責任與權限」，「領袖問題之研究」。2月10日，周恩來去見蔣介石，說明這種宣傳的嚴重消極後果。蔣介石卻推得乾乾淨淨，表示：對主義的信仰並不準備加以限制，孫中山已經說了共產主義與三民主義並不矛盾，我們任何人都不能修改或反對；對各黨派也無意取消或不容許他們的存在，只願溶成一體。周恩來重申：國共兩黨都不能取消，「只有從聯合中找出路」。蔣介石回答：可以研究，並說：《掃蕩報》的言論不能代表國民黨和他個人的意見。陳立夫補充說：蔣總裁已批評了《掃蕩報》，要各報以後不再刊登這類文章。<sup>①</sup>

由於時機還不成熟，對國民黨來說，這只是一場試探性的攻勢，但實在是個不好的兆頭。周恩來已敏銳地預感到：「蔣由鏟共、到合併、到限制的三階段。」他又說：「蔣現在對政權更放鬆，對軍事是一點不放鬆的」，「企圖操縱軍事力量」。<sup>②</sup> 因為中共如果失去了軍隊，即便在政權中分得幾個席位，也沒有甚麼作用，隨時可以被取消，這已由以往歷史的無數事實所證明。周恩來的估計是清醒的，合乎實際的。

---

① 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毛澤東、洛甫並中共中央書記處，並轉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電，1938年2月10日。

② 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1938年9月15日。

既要聯合，又要鬥爭，既要堅持並發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又要保持黨的獨立自主，如何恰當地把握好這個「度」，確實是一個相當棘手而不易處理的新問題。

這時在中共中央內部出現過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那就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周恩來在延安整風時曾一針見血地指出，王明路線的本質是：黨外步步投降，黨內處處獨立。它在黨內不少人中產生過一定影響。但它終究只是局部性的問題，半年多後就得到糾正。

分歧是從抗戰期間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產黨是不是要保持自己的獨立自主引起的。這是統一戰線工作中的根本性問題。

抗戰爆發後不久，1937年8月9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國共合作大體成功，徹底完成是以後任務。」「反傾向問題，一是急躁病，一是適合國民黨的適合主義。保持組織的獨立性、批評的自由。」<sup>①</sup>上海、太原失陷後，他在11月12日又提出：「在黨內在全國均須反對投降主義。」「一定要實行『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這個原則，一定要克服投降主義或遷就主義。」<sup>②</sup>

由於國共合作的極大重要性而蔣介石對共產黨又深懷敵意，如果共產黨在國共合作中沒有保持冷靜的頭腦，放鬆甚至放棄獨立自主，聽任別人支配，那就存在被消滅的危險，這是生死攸關的大事。毛澤東在國共合作一開始就清醒地提出堅持

---

①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37年8月9日。

② 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1、395頁。

獨立自主這個極端重要的問題。這對以後局勢的發展有著至為深遠的影響。

1937年11月29日，擔任著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成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的王明從莫斯科回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通常稱為「十二月會議」。

王明等回國前三天，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帶了王明、康生、王稼祥去見斯大林。斯大林叮囑：「對於中國共產黨現在的基本問題是：融入全民族的浪潮並取得領導地位。」<sup>①</sup>他又說：「你們中國現在搞統一戰線，要注意自己不要叫人家統走。要有決心到大海中游泳，但又不要把自己淹死。」<sup>②</sup>這是共產國際的基本態度。

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做了長篇報告。他重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國共合作的重要性，這本來不成問題。而他著重強調的卻是：「目前的中心問題是如何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如何鞏固統一戰線，即是如何鞏固國共合作問題。我們黨雖然沒有人破壞國共合作，但有同志對統一戰線不了解，是要破壞統一戰線。」他所指的就是洛川會議強調的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必須堅持黨的獨立自主問題。他說：「在統一戰線中兩黨誰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國政權與軍事力量上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沒有力量，空喊無產階級領導是不行的。空喊領

---

① [保]季米特洛夫著，馬細譜等譯：《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頁。

② 薄一波在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第十次辦公會議上的講話，轉引自徐則浩著：《王稼祥傳》，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6年版，第288頁。

導，只有嚇走同盟軍。」

他提出一個口號：「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現在我們要用這樣的原則去組織群眾。」他舉例說：「我們對政權問題，不要提改造政權機構，而是要統一的國防政府。」「行政制度在山西等地區不能建立與（陝甘寧）特區同樣的政策，要同樣用舊縣政府、縣長，不用抗日人民政府。」既然他說在統一戰線中「要承認國民黨是領導的優勢的力量」，那麼，他所說的「一切經過」和「一切服從」，只能是一切都要「經過」和「服從」蔣介石。

對軍事問題，王明更強調要實行「統一」。他說：「我們要擁護統一指揮。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我們不怕統一紀律、統一作戰計劃、統一給養，不過注意不要受到無謂的犧牲。紅軍的改編，不僅名義改變，而且內容也改變了。」「我們八路軍、新四軍是要向著統一的方向發展，而不是分裂軍隊的統一。過去提國民黨片面抗戰，是使他們害怕，要提政府抗戰很好，要動員廣大人民來幫助抗戰，不要提得那樣尖銳。」「在抗戰條件下不怕國民黨的限制，而是我們的方法不好。人民擁護八路軍，許多同志過於高興，也是不好的。」<sup>①</sup>

政治局內許多人把王明的話誤看作是共產國際的意見。國共兩黨經過十年內戰後又重新合作，是十分缺乏經驗的新問題。要重新合作，不能不作出一些讓步，有的是重大的讓步，如停止土地革命。怎樣恰當地處理合作和保持獨立自主的關係，許多

---

① 王明在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1937年12月9日。

人心裡還不那麼有數。所以，不少重要領導人檢查過去的統一戰線工作，在不同程度上做了過分的自我批評。如說：「抗戰以來對國民黨本質上的轉變估計不足」；「我們強調獨立自主，便走到與統一戰線對立起來」；「把全面抗戰與片面抗戰對立起來」。有的以往同王明關係密切的成員還說：「群眾運動，一切要為了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sup>①</sup> 這樣，就造成黨的領導層內的思想混亂。

毛澤東在討論時發言說：「在統一戰線中，要了解『和』與『爭』是對立的統一。目前應該是和為貴。」「八路軍與游擊隊應當使成為全國軍隊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區別。」「如果沒有共產黨的獨立性，便會使共產黨降低到國民黨方面去。國民黨與共產黨誰吸引誰這個問題是有的，不是要國民黨吸引到共產黨，而是要國民黨接受共產黨的政治影響。」<sup>②</sup>

當時，毛澤東的處境十分困難。延安整風時，他說到這件事：「我是孤立的。當時，我別的都承認，只是持久戰、游擊戰、統戰原則下的獨立自主等原則問題，我是堅持到底的。」<sup>③</sup>

儘管如此，十二月會議並沒有形成決議案，中共中央的常委成員也沒有變更，因此依然能繼續貫徹執行洛川會議的政治路線。

十二月會議結束後，王明不願留在延安，而急於去武漢。那時，南京剛剛失陷，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黨政軍機關都移駐武

---

① 十二月會議記錄，1937年12月10、11日。

② 毛澤東在十二月會議上的報告，1937年12月10日。

③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13日。

漢，全國各界各派愛國民主人士、社會名流和各國外交官、記者也大多集中在這裡。顯然在王明看來，只有武漢才是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急著要趕到那裡去。周恩來後來指出他「十二月出去意在入閩」，毛澤東說他「梳妝打扮，送上門去」。12月21日，他和周恩來等在武漢去見蔣介石。蔣介石當天日記中只淡淡地寫了一句：「與共黨等談組織事，此時對共黨宜放寬，使其盡其所能也。」<sup>①</sup> 這是蔣介石第一次見到王明，日記中連王明的名字也沒有提到，可見他並不看重王明。周恩來後來說：「當時蔣介石也不要王明，連個部長都沒給他當。毛澤東同志說：要是給他一個部長當，也許情形更壞。」<sup>②</sup> 周恩來還說過，王明沒有被蔣介石選中的一個原因是：腳跟輕，腹中空，未為人所重視也。

12月25日，王明會見美國合眾社記者白得恩時說：「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先生精明堅決，雄才大略，力能勝任領導全國抗戰。」又說：「抗戰以來，中國在各方面已有相當進步，例如政府開始成立全中國統一的中央政府」，「同時，開始建立了全中國統一的國民革命軍的基礎，更有重大意義」。<sup>③</sup>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舉行政治局會議。王明從武漢回延安參加會議，再一次系統地發表他的右傾錯誤主張。會後，他到武漢又不經中共中央同意而以個人署名

---

①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年12月21日。

② 《周恩來選集》編委會編：《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1、312頁。

③ 陳紹禹：《王明選集》第5卷，[日本]汲古書院，1975年11月發行，第77、80頁。

公開發表一篇《三月政治局會議的總結》。該總結寫道：「國民黨現在在政府與軍隊中均居於領導地位」，「陝甘寧邊區政府是中華民國的地方政府之一，服從統一的中央國民政府」。他還強調：「須要建立統一的國家軍隊。」它的基本條件有七條：統一指揮，統一編制，統一武裝，統一紀律，統一待遇，統一作戰計劃，統一作戰行動。怎樣作戰？他要求：「確定和普遍地實行以運動戰為主、配合以陣地戰、輔之以游擊戰的戰略方針。」<sup>①</sup>

對蔣介石在國共合作中的政治態度應該怎樣估量，這是如何對待其政策的依據。應該說，蔣介石此時決心並積極投入抗日戰爭是值得肯定的，對共產黨的態度也確有改善。但他總想有朝一日要消滅共產黨。1937年12月1日，他在日記的「對共黨對軍閥政客之方針」中寫道：「未至潰決，當以苦心忍耐處之。若果一旦崩潰，則無此顧慮，惟以非常手段處理。」<sup>②</sup> 這裡，早已透露出殺機。12月10日，也就是十二月會議的第二天，蔣在日記中寫道：「以全局設計，應暫使能與共黨合作抗倭，似為相宜。」<sup>③</sup>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一個「暫」字，可見在他看來國共合作只是權宜之計。13日又寫道：要注意「共黨陰謀與反動派」，「如一旦潰決，只有快刀斬亂麻，成敗有所不計也」。<sup>④</sup> 蔣介石一直在磨刀霍霍，待機下手。如果按照王明那

---

① 《群眾》週刊，第1卷第19期，1938年4月23日。

②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年12月1日。

③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年12月10日。

④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7年12月13日。

套主張去做，在合作中解除一切戒備，甚至連「八路軍也要統一受蔣指揮」，那無異束手待斃，蔣介石一旦翻臉，勢必葬送黨，葬送革命。

王明的問題，已到了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

武漢失守前後，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這次全會的目的是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教訓，並解決以王明為代表的右傾錯誤，確定黨在抗戰新階段的方針和任務。剛從莫斯科回國的王稼祥帶來了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意見和共產國際的書面文件。季米特洛夫的意見是：「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為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sup>①</sup> 共產國際的書面文件中說：「要保持統一戰線中各黨派的獨立性，不要在統一中束縛自己的手足，最低限度綱領是不能讓步的。」<sup>②</sup> 這些，在全會前的政治局會議和全會上都做了傳達。王明在黨內、特別是做實際工作的各級領導幹部中本來就沒有多少根基，只是拿了「共產國際」的招牌來嚇唬人。這塊招牌一旦拆穿，他遺留的問題就不難解決。

在中共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做了《論新階段》的報告。報告首先肯定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全中國形成了一個空前的抗日大團結，形成了偉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個戰爭是為了把中華民族從半殖民地狀態中從亡國滅種危險中解放出來的戰爭」。同時，也明確地批評大後方出現的壓制民眾運動的現象，指出：「敵人乘我弱點之處，不但在軍事，而且在政治，在

---

① 《王稼祥選集》編輯組編：《王稼祥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頁。

②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1943年11月13日。

我政治制度之不民主化，不能與廣大人民發生密切的聯繫。」  
「長期艱苦的抗日戰爭，一切須取給於民眾，沒有普遍發展的  
並全國統一的民眾運動，要長期支持戰爭是不可能的。」<sup>①</sup>

在全會將結束時，毛澤東做了結論，針對國民黨的新動向  
和黨內出現的右傾錯誤思想，毫不含糊地把「統一戰線中的獨  
立自主問題」作為主題之一。他說：「為了長期合作，統一戰線  
中的各黨派實行互助互讓是必需的，但應該是積極的，不是消  
極的。」「用長期合作支持長期戰爭，就是說使階級鬥爭服從  
於今天抗日的民族鬥爭，這是統一戰線的根本原則。在此原則  
下，保存黨派和階級的獨立性，保存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  
不是因合作和統一而犧牲黨派和階級的必要權利，而是相反，  
堅持黨派和階級的一定限度的權利；這才有利於合作，也才有  
所謂合作。否則就是將合作變成了混一，必然犧牲統一戰線。」  
「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  
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  
統一，又獨立。」<sup>②</sup>

當抗日戰爭正從戰略防禦階段轉入戰略相持階段的歷史  
時刻，明確地提出並解決這些問題，統一全黨的思想，有著極  
端重要的意義（當然，從思想方法的高度來總結以往的經驗教  
訓，樹立實事求是的新傳統，還有待延安整風來解決）。如果  
前面所說的這些問題沒有在抗戰第一階段正要結束時在黨內得

---

① 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 11 冊，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60、561、611、613 頁。

② 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版，第 537—540 頁。

到解決，中國共產黨就很難在新階段到來後更複雜的情況下清醒而正確地應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愈演愈烈的種種更加複雜的問題。

### 三、磨擦怎樣進入高潮

武漢、廣州相繼失陷後，抗日戰爭進入以戰略相持為特徵的新階段。國共關係卻明顯惡化，磨擦行動逐步進入高潮。這是甚麼原因呢？

前面說過，蔣介石對國共合作，很大程度上是不得不做出的最後選擇。他對待中國共產黨態度的好壞，是隨著他受到日本侵略者軍事進攻威脅的大小而轉移的。最初，日方根據以往經驗，以為只要「對華一擊」，不難「速戰速決」，使中國屈服。盧溝橋事變後才九天，徐永昌日記在 7 月 16 日載：「昨聞日陸相發表談話云：中國如同兒童所弄之輕氣球，不值一擊。」<sup>①</sup>不料在一年多的作戰中受到中國軍隊和民眾的頑強抵抗，而對新佔領區又要分兵據守，它實際上有限的兵力再也無法保持原有的進攻勢頭。戰場上的消耗，使新兵比重增加，軍隊素質也明顯下降。日方自己編寫的戰史寫道：「這樣，對華作戰未能殲滅中國軍之主力即已達到攻擊的極限，而以此態勢進入長期持

---

<sup>①</sup> 徐永昌著：《徐永昌日記》第 4 冊（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年影印，第 77 頁。

久戰。」<sup>①</sup> 日軍已力不從心，同前一階段在華北、華中、華南的凌厲攻勢相比有了明顯差別。

蔣介石也多少覺察到這種變化，他在 1938 年 11 月下旬的南嶽軍事會議上說：「日本佔領了武漢並接著佔領我們長沙和南昌，然而他進到岳州以後，就不能再攻進來，這就證明他的力量不夠，氣勢已衰。」<sup>②</sup> 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在日記中也記錄蔣介石的話：「敵人兵力已使用至極高度，已無可再發展之處。」<sup>③</sup>

日本軍事進攻壓力的減輕，使蔣介石鬆了一口氣，卻把目光又更多轉向如何限制共產黨力量的發展上來。本來，他以為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只有四萬多人，武器裝備又差，力量不大，開往敵後以後，在日軍的反覆「掃蕩」下，至少將極大地被削弱，也許會被消滅，結果卻在民眾全力支持下迅速發展起來，這是他怎麼也沒有料想到的。他在 1938 年最後一天的日記中寫道：「共黨乘機擴張勢力，實為內在之殷憂。」並在同天寫道：「共黨禍亂成性，叛跡日著，明年惟對此為最大問題之一，倭寇實已不能再為深患矣。」<sup>④</sup> 經過這樣的比較權衡，在他看來，日軍的入侵不再是「明年」的「最大問題」，他已急於要制

---

① 《日本軍國主義侵華資料長編（上）·〈大本營陸軍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461 頁。

②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對日抗戰時期》第 3 編（1），台北，1981 年版，第 130 頁。

③ 錢世澤編：《千鈞重負：錢大鈞將軍民國日記摘要》（二），台北：中華出版公司，2015 年版，第 693 頁。

④ 蔣介石日記（手稿本），美國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藏，1938 年 12 月 31 日。

## 後 記

一、本文曾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 70 周年時，在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主辦的《中共黨史研究》上連載。原題為：《抗戰期間國共合作中的聯合與鬥爭》。由於刊物的篇幅有限，文字力求從簡。現在承出版者好意，單獨出版，趁這個機會，又適當做了補充。

二、本文的主題是抗戰期間國共關係的演變，而不是對這個時期中國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社會、外交的全面論述，現有的內容已經夠龐雜了，其他方面許多重要內容在文中只得省略。

三、文中提到作者過去所寫的《華北事變和抗日救亡高潮的興起》《七七事變前蔣介石對日政策的演變》《抗戰前夜中共中央戰略決策的形成》三篇論文，內容都同本文有關。為了減少讀者翻檢之勞，現一併作為本書附錄，特此說明。

四、本書付排時，台北的政治大學人文中心出版了《民國某某年之蔣介石先生》（從 1937 年至 1945 年，共十三冊）。它是將蔣介石親自審定的《蔣介石檔案·事略稿本》的這幾年各冊排印出版的。《事略稿本》中原缺 1937 年下半年和 1939 年，

這次出版時將所缺部分根據底稿檔案補全。不少讀者可能不了解《民國某某年之蔣介石先生》同《事略稿本》的關係，附此說明。

金沖及

2017年6月29日